

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1872—1877）

范继忠

【摘要】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1872—1877）过程，是上海近代大众传媒早期发展的缩影。上海城市化中的移民方式、租界的领事裁判权和西方人所办报刊是它的市场基础，其办报宗旨是以文化沟通功能为本，并为社会正义代言；《申报》的传播特点表现为继承江南传统城市文化要素，立足上海同时涵概整个华人社会；商贾信息和民间立场是《申报》的市场出发点，对杨月楼案和杨乃武案的报道使其深度融入上海社会。

【关键词】《申报》市场 初步形成 上海 传播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5)-01-0093-11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Market of Shenbao in Shanghai (1872-1877)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market for Shenbao (1872-1877) represented the epitome of the early growth of modern mass media in Shanghai. Shanghai's immigration-driven urbanization,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of concessions, and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ich Westerners established, foreshadowed its basic market. The management of Shenbao insisted on taking cultural connection as its base and as being a spokesperson for social justice. Based in Shanghai, Shenbao inherited essential factors of traditional urban culture in Jiangnan area, but it covered the entire Chinese community. Shenbao's starting point was commercial information and popular opinion. Reportage of the cases of Yang Yuelou and Yang Naiwu marked Shenbao's deep fusion with Shanghai's society.

《申报》（1872—1949）是一份影响深远的近代华文报，由英商美查^①与友人在上海汉口路创立（原名《申江新报》）^②，美查开宗明义宣称其“原为谋利所开耳”^③，将《申报》定位于以华人为市场和经营主体的商业性报纸。20世纪上半叶文化界对它的评价通常限于政治舆论功能，一般以辛亥革命为界抑前而扬后，典型说法如“上半部无足纪，所重要者在下半部”^④；梁启超也认为其体例“无一足取”、“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⑤。但从社会文化功能角度看，这种评价显然不够客观。

“《申报》纸”在清末民初的民间，几乎成为报纸的代用词；晚清时《申报》在上海已形成兼营日报、期刊、书籍出版的经济实体，以其多方面的首创性，成为众多华文报刊的模本，所谓“报坛耆宿，一报之迁革，殆即中国近世报业进展之雏形”^⑥，可作为近代大众传媒的典型个案来研究。《申报》与上海社会的互动关系贯穿其发展始终，本文旨在从《申报》初创时的市场基础、空间定位、与西方势力的关系、与上海城市文化市场的衔接，来说明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社会的初步形成及二者的

【收稿日期】2004-10-20

【作者简介】范继忠（1968—），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北京 100875

融合。

一、《申报》市场基础的“前工业”特征

《申报》的笔务和市场皆以华人^①为中心，其商业性比此前外国人在沪所办报纸更加浓厚；当时上海在人口、通讯、交通网和凸版铅印法运用等方面亦具备现代报纸产生条件。但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申报》一直使用人工手摇转机印刷，这种手工业生产状态与其市场基础的“前工业”性直接相关。正如梁启超1901年断言的“其发达之迟缓而无力，独未有如中国之报馆者”^②，晚清报纸的受众与总人口数量相比较为悬殊，《申报》初创时尤其如此，其受众源有着根本的局限性。

埃默里关于现代报纸的七个要素^③可概括为工业性、大众性和时效性。现代报业产生的基础可简括为：产业革命一造就大批产业工人一大众化教育的普及。这个过程与近代城市化过程融合为一：“识字的都市工人们，随劳动条件改善、生活水准提高而逐渐成为巨大的信息需求层，成为19世纪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登台的大众报纸的几万乃至几十万读者。”^④现代报业显然源自产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但上海城市化动力并非工业对农村人口的自然吸附，而是战争和灾荒移民。太平天国战事使上海在1852—1870年间人口骤增近20万，移民主要迁入租界，成为上海城市人口（不含外侨）的主体。移民进入机器工业企业的很少，19世纪70年代初松、祥生船厂和江南制造总局加起来才约有工人2,300人，绝大多数移民从事商业和服务业。1865年的一份公共租界抽样调查表明：在有职业的6,580个华人中，人数居前十位的职业依次是苦力、百货商店业主、裁缝、鸦片馆业主、洋行雇员、木匠和建筑工及承包商、杂货商和供应商、船民、船商和丝商及棉商、钱庄主和助理。^⑤这种“商强工弱”^⑥的格局一直持续到甲午战前，70年代产业工人在上海人口比例中的增长弱势，无法使近代大众化教育迅速发展，《申报》缺少“现在时”的基本信息需求层，其产生的文化动力源主要来自旧的社会阶层。

人口教育结构承袭旧式格局，缺乏普适性社会信息需求。虽然移民在城市人口中最具活力，但在19世纪70年代初尚未给上海带来更多的新文化因素。有学者指出，近代上海移民如按“移民们的最初的和最主要的动机”^⑦，大致分为主动移民（谋生、求学、享受）和被动移民（避难、随从）两种。以此衡量，50—70年代初移民目的以被动型的避难为主，兼有谋生目的。一方面，大量普通劳动者源源不断进入上海，如在太平国战争中不断逃向上海的苏、浙、皖难民，50年代末黄河决口时苏北人“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⑧形成的苏北移民潮，使以农民为主的下层贫民成为移民主体；另一方面，同时期“江南衣冠右族避地转徙”，“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⑨，旧士绅阶层是移民中人数较少但文化水准较高的部分。唐宋以来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旧教育，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士绅阶层文化符号表达系统，而下层社会则以生活化的口语为主要交流媒介。从符号学意义来看，“符号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从“原来整个社会，即各个不同社会集团所通用的交际工具中提炼、选择而成”，“阶级符号源于而且不可能分离于公用符号母体”^⑩，作为思想表达的符号，书面汉语与口头汉语、士绅的语言和文盲的语言间没有本质的鸿沟，实际差别只是因社会利益、认知、心理等差异而导致的社会语境差异，大众化的近代学校教育是弥和差异的途径。但当时上海学校的数量与人口猛增严重不符，儿所传统书院^⑪的教学招生与近代学校相去甚远；官方创办的广方言馆以培养外语实用人才为主；而西方人办的十几所教会学校则多是附设在教堂的小学^⑫，教学主要用外语，基本目的是救贫和传教，其招生和教学都远不具备近代大众教育的意义。由此，大众教育的缺席，使各阶层的知识、经验、社会心理的沟通融合，缺乏近代西方社会建立在近代学校教育上的普适性知识背景；在掌握汉字书面知识的士绅阶层和文盲或准文盲之间，尚未形成一个近代市民性的公共信息传播环境。《申报》在先天发育不良的报业市场基础上，借助发达的商贸业、自身舆论的民间立场、基于江南传统城市文化的审美及心理特点，较为成功地弥补了上述先天不

足。

二、《申报》市场拓展与上海西方势力的关系

租界领事裁判权及其派生的会审公廨制度是《申报》稳定经营的制度基础。

《申报》在政治上依托租界生存的模式，是上海早期报业的缩影：“报馆设立在租界上，不受当地官厅的制止……各报馆除寄生在租界上还不足，又拉拢外股挂洋商招牌，新闻、申报……能惨淡经营至七、八十年历史，便在这洋商发展的力量上。”^⑨《申报》初建时将馆址选在公共租界，由美查联合三位英商合资筹办，在整个晚清时期基本都由外商做法人，比只拉洋商做招牌的报馆拥有更纯正的西方背景。《申报》初创时，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制（1868年）已“历年既久，租界居民日众，实际上办法日有变更，外国领事之权即日有增加”^⑩，正值权限扩张时期。会审制名为中外共同审理案件，而且适用中国法律，但实际上“旧日吾国法律习惯与外人不同，故审判时外国会审官多参酌外国法理习惯，是以修改会审衙门章程第九条有‘凡审讯案件如照华例并无成案可查，会审公堂应照商民相沿之法公平断讞’”^⑪，因而租界内华人也有一定的司法特权，在制度层面上强化了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权地位。这种情况给《申报》可进可退的自由度：它站在华人立场批评外国人和以工部局代表的外国租界当局时，依据的主要是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或租界的制度章程；当它越过议政界限而触动清政府利益时，其外商所有的身份和租界的有效司法程序，就成为这种矛盾的自然缓冲器。如此，租界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申报》人事的稳定和连续性^⑫，成为《申报》拓展市场的制度保障。

由西方传教士主笔的华文报刊，对《申报》市场的积极作用大于对它的竞争压力。

教会报“虽注重宗教宣传，但都附载时事新闻。由于信教者的扩张，新闻的功效之观念乃随着宗教宣传品深入于社会各方面”^⑬。它们对上海人新闻意识的启蒙虽极有限，但客观上给《申报》提供了有益的市场环境。《教会

新闻》是《万国公报》前身，在1876改版之前只是单一的传教刊物，“此报既专言宗教，则销路自不能畅”^⑭，与初创的《申报》基本是各行其道。真正与《申报》有过竞争关系的《上海新报》^⑮，曾声言“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⑯，因此被称为“流通市场消息”^⑰的“市场扩音机”^⑱，可看作《北华捷报》和《上海通信》^⑲的业务拓展。《上海新报》在1868年后虽也有各报选录和一般新闻，但广告、商品行情、货船表内容仍占四分之三篇幅，日发行量未突破过400份，实际上仍未脱为外商服务的贸易行业报性质。与《上海新报》相比，《申报》有明确的市场意识，明言“所卖之报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持者唯华人”^⑳，因此在短暂的并存期间，《上海新报》对《申报》几乎亦步亦趋而丧失市场主动性，不久停刊。《上海新报》竞争失败的表面原因是经济成本较高（用上等白报纸双面印刷，而《申报》用廉价毛太纸单面印刷），其实际根源却在于文化适应性不足。其一，《上海新报》是英文《字林西报》的中文附属，其基础由对太平天国的独家报道^㉑偶然奠定，在经营和稿源上都不具备《申报》的稳定性。其二，西方主笔对中国文化认知有限。初期《申报》除经营投资事务外，几乎所有文字工作都由华人主持，主笔^㉒皆是上海文坛佼佼者，几乎每人都具有“每出一篇无不骇其敏捷”^㉓的文字功底。《申报》创刊首月刊登24篇论说，内容除介绍铁路、轮船、西医、开矿外，涉及当时社会的陋习、伦理、考试、市政等焦点问题，其中对禁烟、禁娼、缠足、科举、团练等本土问题的关注，尤显主笔自身的认识功力。而《上海新报》前后三位主笔都是英美传教士^㉔，观察家式的身份使他们对汉语及中国社会的把握与本土主笔难以相比。《申报》面世和《新报》终刊，意味着近代华文报刊发展“主题性”^㉕阶段的结束和“市场性”阶段的开始，外国主笔将在华文报刊的商业时代退场。

《申报》创立时上海的英文报刊主要有《北华捷报与市场报道》、《字林西报》、《远东释疑》季刊、《上海要闻与每周使报》、《上海通信》月刊；法文报刊有《上海新闻》周刊、

德文《德文新报》周刊等。^④这些外文报主要面向在沪外国人，同时通过海外版或原版邮寄方式发行海外。对此民初上海名人姚公鹤曾说：“上海报纸，于不受政治暴力之外，尤得有一大助力，则取材于本埠外报是也……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报译录……转登外报，既得消息之灵便，又不负法律之责任，其为华报之助力者大矣。”^⑤这些外文报不是《申报》的对等市场竞争者，相反成为《申报》初创时便捷的国际新闻源。

在上述背景中，对于报纸舆论监督的政治功能，《申报》在认识和经营两个层面采取了不同标准。创刊不久，《申报》即表示对清当局钳制言论的强烈不满：“各官之恶新闻纸也，必欲毁其馆火其纸逐其人而后快于心……若言士夫欲禁此事，不知能禁中字之新报，果能禁西字之新报乎？”^⑥此文明确肯定新闻自由的意义，辞锋相当锐利。但在同文中，新闻报道的谨慎策略也被同时提出：“吾愿为新闻纸者慎勿品评时事、臧否人物，以撻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羞，岂不彼此有益，各行其是哉！”^⑦这种“各行其是”的现实态度，形成《申报》1905年大改版前的保守基调，期间它对尖锐的政治问题大多较为低调，但对富于政治内涵的社会风俗革新和社会公正（如禁烟、废娼、革陋俗及倡导洋务、改革司法）则颇为积极；它的主权者为英籍商人，但却并不特别维护外籍人利益而忽视华人尊严。这种保守稳健中蕴涵锋芒的文化风格，是上海租界环境和相应社会心理的产物，同时与主笔所属阶层的文化特征相关^⑧。

三、《申报》的空间定位

《申报》的空间定位，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它的地域角色定位，二是它的版面内容空间分配及其内涵。空间定位体现着《申报》在不同层面上对地域文化的超越或吸纳，即《申报》在政治上的非地域性和文化上的地域性特征。

首先，《申报》的经营立足上海，但其传播意识涵盖整个华人社会，现代新闻意识尤其超越了地区角色。《申报》原名《申江新报》，

其中“新”字旨在与主要登载官场消息的古老《京报》示别。在《申报》初创前五年关于新闻业的论说中，较重要的有《创刊告白》、《申江新报缘起》、《论各国新报》、《论本馆作报本意》、《论新闻日报馆事》、《邸报别于新报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报》、《论日报》、《与友论新报所论事》、《申报总录后》^⑨等篇目，明确声称“中国不欲西法则已，欲取用西法，则必自报纸开始”^⑩，毫不讳言发展报业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先声。在告白和自叙中，《申报》又将这个宗旨具化为“寓劝惩以动人心，分良莠以厚风俗”^⑪；读者来稿《日报文仿制仪礼》对报纸的看法较有代表性：“夫谈政事于平民，笔底生花，天子可取以立政；而论人心于此日，词头霏玉，小民可藉口以砭心，具盖世才作消闲计。”^⑫可见《申报》并非只从上海本地利益和单纯的商业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和民族的视角阐发现代报纸的普世价值，其行业开创者意识，与上海的经济地位遥相呼应。

《申报》对自身宗旨的阐述要素为：以充当文化媒介的社会功能为重，淡化舆论监督的直接政治功能。《申报》声明其体例仿自直接承袭西方报纸传统的香港华文报，“今仿其意，设《申报》于上洋……”^⑬，但对报业宗旨的阐述较为独立，可概括为文化沟通目的和正义性原则。关于文化沟通性，《申报》曾以美查名义阐明：“盖欧洲诸国数百年来新闻纸出刊，而天下之名山大川、奇闻异见，或因其人而传之，或因其事而传之……其所以日新而月盛者，非新闻纸其谁归美乎？”^⑭进而指出中国“声名文物从古及称盛”^⑮，文化资源丰富，有价值的人事和议论因缺乏媒介而湮没不闻，传统的《京报》只能上情下传却无法将民意上达，《申报》就是要以简约通俗取胜，“使人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之事”^⑯。《申报》对正义性原则的阐述，运用了“忠”、“义”这两个儒家伦理概念：“本馆不敢自夸惟照义所开，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本馆惟执公道，亦所不惮也……对国家使除其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之正道。”^⑰从《申报》的实际内容看，“义”指维护华人传统道德规范、上海城市社会秩序和租界弱势华人权益；而“忠”

则指更宏观的民族利益。《申报》不仅市场面向华人，其道德尺度和话语方式也紧贴中国社会，传播中国人视野中的新闻，诸如“国家政治、风俗变迁、中外交涉、商贾贸易以及一切可惊可喜之事”^⑨，因此严格来说，它属外人在华创立的华人报而不属于外人在华报纸，这两个概念^⑩性质不同。

第二，初期《申报》版面分配形式上以地域界分，而其信息内涵更反映文化实质，“江南区域空间”^⑪的文化传统是《申报》赖以生长的精神母体。

1877年前《申报》版面格局如从所涵盖地域看，基本是立足上海——向西辐射长江中下游口岸城镇——南北连接起港粤和京津地区；从文化内涵上大致可分为政治生活和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两大部分。在八个版面较固定的栏目中，京报全录、宫门抄、港报转载、附译外报各栏中主要是谕旨、清廷及地方政令、军政外交事件、海外时事、科举试题等政治信息，占大部分篇幅；本埠新闻和外埠新闻等地方消息、广告、诗文、（租界）会审公廨消息等基本是上海社会生活的空间。从比例来看，上海的内容只是本埠新闻和会审公廨消息，但论说部分约有五分之一篇幅具体论及上海的烟、赌、妓、民风、市政、丝茶行情等问题，许多时论也以上海作为观察坐标，有明显的地域偏向；广告则绝大部分是在沪洋行、丝茶商所做。以1872年5月29日版面主要内容为例：

《告白》 《附录笑笑山人烟馆月捐纪事》（本埠） 《辩惑说》 《洋货信息》（本埠） 《拟请女堂馆议》（本埠）
《查窃电线》 《海中浮木》（川沙灵木传说） 《办牛瘟事》 《浮江標佛》
《附香港新报》 《西人入妓院》（本埠）
《四月初二日京报全录》 《会审公案》（本埠） 广告若干

此日的上海消息约占一半比例，都是实地实报道；而外埠消息，除了港报选录和来自《京报》的官场消息，其他更象无明显新闻特征的娱乐小品。从1872年4月到年底，《申报》所发892条消息（不含广告）的空间分布，与上述比例基本相似：上海本埠374条，

占总数的42%；外地266条，占总数的30%；国外252条，占总数的28%。上海本埠指由闸北（宝山县）、南市区（县城老区），以及英、法、美、日各租界组成的市区，除了近郊区外，《申报》在前五个地区都专门雇访员采访地段新闻。初期《申报》所录《京报》和《宫门抄》内容中的有效信息，与其冗长的篇幅不成比例，外地消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亦不能保证，而上海本地消息虽占版面空间较小，信息质量却高于外地。

从《申报》信息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可看到形成中的上海城市文化与江南传统城市文化的亲缘关系。在1870年前后的江南地区，上海虽已替代苏州和杭州成为经济中心，但其城市文化^⑫仍处在模仿酝酿阶段，苏杭的戏曲、小说、工艺品、画作、服饰甚至苏州方言在沪仍被崇尚和摹仿，这种社会心理的惯性在《申报》文本中表现为对苏、杭等城市文化“故地”的特殊关注与认同。《申报》曾在创刊次月开“苏申新闻”栏目，将苏州和上海两地的短讯集结登出，把江南之外的消息统称为“中外新闻”，而外地消息除了一些口岸或大城市外，一半出自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常州、宁波、南京等江南中等城市。《申报》的江浙籍主笔在旧日关系网中征稿，声明“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理水源之类者……附登斯报，概不取值”^⑬，对来稿不收刊登费^⑭。脱胎自江南城市传统的早期上海城市文化，决定着《申报》传播活动的语言及审美风格。为说明《申报》初期文稿的特点，举其创刊后头五个月的一类标题为例：

5/6《寺僧淫报》 5/7《盗因色败》
5/8《匿财斃命》《窃物雷击》 5/11
《盗嫂受讎》 5/12《好博受创》 5/20
《冤讎》 5/21《汉口异闻》 5/23《雷击不孝》 5/27《记清河异闻》 5/29
《时命论》《贪利被骗》 5/31《论孽缘》
6/1《弃婴被讎》 6/3《杀生孽报二事》
《鸡异》《黄鱼胎生》 6/5《西湖异事》
6/7《胎异》 6/11《论宁波异事》
6/16《纪观世音咒灵验事》 6/21《妻死再生》
6/24《蛇异》 6/27《放生戒

杀论》 7/1《南海奇事》 7/8《荫树神异》 7/14《贪利丧货》 7/17《老鸦堕地》 7/20《杭州满城多鬼》 7/22《女仙降乩词》 7/24《鬼讨房饭钱》 7/30《天雨粟》 8/1《东乡奇遇》 8/2《产异》 8/3《木中字画》 8/5《罗浮白鳖精》《冥间奇罚》 8/9《圆光吐睛》 8/13《树中生军机》 8/16《星术记异》 8/17《王孝廉异梦记》《刀笔孽报》 8/19《死往清华殿》 8/26《义马》 8/29《仙媪赠药》 9/3《记遇仙赠丹事》 9/6《详言捉鼠孽报》 9/7《好淫染痲疾孽报》 9/9《劝戒杀放生说》《打蛇获谴》 9/16《宁波奇闻》 9/1《鹤代死》 9/18《牛报仇》 9/21《负债变牛》 9/24《论谗口害人报》 10/1《牛讨命》 10/9《四脚两头蛇》 10/11《记葛井仙丹出现事》 10/14《雷击负施忘恩显报》 10/22《鼠有烟瘾》 10/31《论贪淫失子事自叙》(日期皆为西历)

以上内容又分为孽报故事和异闻传说两类，它们以诡秘荒诞的民间风格夹在真正的社会新闻中频频出现，不具备新闻的基本真实和时效性。除直接登市井传说、神怪志异等杂闻外，以这种聊斋笔法陈述的新闻也比比皆是，甚至一些译自外报的国外新闻，行文中也常见眩奇、搜异特征。明清以来“苏人好文”、“苏州人惯于作小说”^⑤的传统此时在江南地区仍方兴未艾，对故事和传奇的大众审美偏好由“联轳接轳”、“往稻梁乡谋食”^⑥的移民带到上海，在《申报》早期新闻中留下深刻印记。

四、《申报》与上海文化市场的衔接

初创的《申报》因受众的“前工业化”特征和普适性信息的阙如，与上海社会生活有一个曲折的磨合过程，商业信息成为其市场突破口。

在传统大众心理中，报纸发行者与旧式卖“朝报”人无异：“卖朝报为塘役杂役之专业……售时必以锣随行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⑦申报馆一面做启

蒙宣传，一面不得不用原始办法推销报纸：“当其初日印数百份，每份仅一纸，售价八文，除洋行及有竞卖与先令、磅价关系之华商订购长年外，剩余之报逐日雇人挨户分送，受者亦不欢迎，甚有厉色峻拒者……”^⑧姚公鹤亦提到过类似情形：“其有剩余之报，则挨门一一分送于各商店，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饬之者……几与沿门求乞无异。”^⑨在此过程中，《申报》的实用商业信息最先被接受。“上海的华文报纸的发动是由于外商推广营业而起”^⑩，《申报》不间断刊登的广告来自上海的信局、商店、洋行等；《各货行情表》则包罗了上海国内外贸易的主要项目，如洋布、粗布、棉花、钢铁、油类、各种手工艺品等，为中外贸易商提供详细的每日价格表。因此，开始时“常年定阅之家”大多非普通华人，而“盖大率洋商开设之洋行公司及与洋商有关系之各商店为多”^⑪。这些通中文的洋人、洋行买办及雇员、从事洋货购销的中外商人，作为最早的《申报》的读者，虽人数占上海华人总数比例不大^⑫，但其行为对上海社会有潜在的风尚引领效应。

《申报》言论的华人立场是其开拓市场的保证。《申报》从创报伊始，便声明为华人立言而又不刻意迎合的原则：

所卖之报章，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持者惟华人，与西人犹可依持乎？……自知仅为谋利而有短谋，天下智谋之人宁有是道乎？然事事惟谄誉本国，毁斥他邦，虽曰必能媚悦报者，方可多销报纸，亦本馆不屑此浅计也。^⑬

《申报》第三期就“外摆渡桥”一事发表论说《拟易大桥为公桥议》，公开提出废除华人过桥费，词锋直指西人“何以为此贪得无厌”。在《申报》的舆论支持和华人公所努力下，华人最终争得免费渡桥权^⑭。此后，《申报》就中外关系、租界华人权益、西人在华特权等问题广泛发表论说，以1877年前一些重要论说为例：

《拟建水池议》、《信局论》、《西洋人多行无理论》、《议西字报关来书》、《澳门猪仔论》、《外蒙古俄罗斯接壤侵占论》、《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以保卫商民论》、《论

英华会审事》^⑥、《上海饮水秽害亟宜清洁论》、《劝城内绅董举办自来水说》、《西友论中国积弊来函》、《拟上海租界仿照香港延请华绅会议地方事宜议》、《论西人拟请上海租界添设一县事》、《论西人谋止租界厘捐事》、《华民出洋说》、《论古巴华工宜令赴美受雇》^⑦

这些题目遍涉租界华人及整个华人社会的现实问题，如将《申报》论说之外有关题目算在内，此类内容范围更为广泛。此外，创刊头三年中《申报》与《字林西报》和《汇报》^⑧的笔墨之争，所涉皆是为华人争取权益问题，客观上给《申报》以展示华人立场的契机。

对杨月楼案、杨乃武案^⑨的深度报道和参与，使《申报》在融合上海各阶层社会心理基础上，大众传播功能凸显，初步融入上海大众文化市场和社会生活。

首先，两大社会新闻作为连接“新闻真实”和“事实真实”，从而完成“信息的传达”作用的“新闻符号”^⑩，涉及了当时上海社会主要社会群体，其承载信息具有时代典型性。杨月楼案当事人的大致阶层象征性为：杨月楼——倡优阶层；杨妻韦阿宝及族叔韦某——上海移民中的商人阶层；上海知县叶某、松江太守——官僚阶层。杨乃武案发生的杭州，与上海社会有特殊的文化渊源，其人物同样被关注：杭州——江南前文化中心城市；杨乃武——旧式士绅（临被捕前中举）；葛品莲夫妇——城市小商人；沈彩泉与刘翰——城市无业游民；刘锡彤及同行——腐败官吏；慈禧和都察院——皇权。因此，上海官、绅（含职员和自由文人）、商、工、优等诸社会阶层，都能从自身经验和身份出发，在两案报道中找到阅读的心理共鸣点，正如研究者所言，“受众往往无意地（或似乎以千方百计形式显现出来）从新闻符号信息流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与自己原来价值观念相一致的东西，从而来证实自己固有观念的正确性，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观念”^⑪。两案被《申报》频繁报道并被市民关注，有先行的社会价值取向在其中；两案表层的冲突和矛盾，隐含着上海新旧社会阶层变动的深层信息。其一，传统的倡优阶层要突破旧日“贱民”的身份定位。上海开埠尤其是

京班南来以后，“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⑫，原处于社会边缘的倡优阶层在需求庞大的娱乐业市场中，其低贱身份逐渐被淡化，甚至开始引领某种时尚潮流：“自京班来沪，一时官商士庶强半京装。其盛者，男则宽衣大袖学优伶，女则靓妆倩服效妓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上海初不知二黄调，今则市井儿童亦能信口成腔。风气移入，一至于此。”^⑬杨月楼是当时最红的京剧艺人，时人描绘其魅力曰：“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⑭在这种宽松狂热的享乐气氛中，上海“工商士庶”对名优杨月楼与平民联姻的同情，在《申报》的报道中得到共鸣和强化，也得到一个公共的表达平台。其二，官与民要超越旧式主与奴的关系。对杨乃武案的报道，涉及到上海市民初萌的民权和法律观念。会审公廨制在1853年实际形成（英、法、美三国对租界内华人行使领事裁判权，限于轻案及违警），1868年固定并延续下来。关于租界会审制对上海社会司法观念的影响，有论者谈到：“西方人认为会审公廨太‘中国化’，而中国人则认为它太西化。但是，随着多年来的报纸宣扬，西方法律及审判观念的显示，意味着上海的普通‘路人’要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具法律意识。”^⑮这种意识在70年代初已见端倪，当时有《会审公堂》一诗云：“会审纷纭有异同，从来治事贵和衷。主持公道无私见，都在堂皇一审中。”^⑯诗作者对会审公廨的认同至为明显。同时期上海人对现代律师的态度亦趋于客观：“外国人涉讼两造，均请讼师上堂……如中外涉讼，华人亦请外国讼师。小事在会审公堂，大事在外国按察司处审理，讼师之名，中国所禁，外国反信而用之，亦可见立法不同矣。”^⑰在租界法律氛围对比下，余杭县、浙江省对杨乃武一案审理的荒谬草率，尤其是酷刑逼供，以较极端的方式比衬出大清官场和司法制度的黑暗面。这些事实通过连续报道和评论被渲染传播，加上杨乃武本人乡绅兼旧式名“讼师”的身份，客观上使事件严酷性和两种司法制度的反差愈益明显。《申报》在报道中曾尖锐质疑刑讯制度：“常有西人往观中国演戏，皆笑谈曰：一案犯初不招即批其颊，再不招即杖其臀，复不招，

男则夹其腿，女则搯其指，而犯人招矣……初则谓此不过演戏耳，不料后见官场讯案，亦复如此，始知中国今亦不异于古所云也……”^⑧《汇报》指斥《申报》报道两案是公开蔑视清廷法律，《申报》回复以“本馆指陈刑讯之惨，以故地方官怒而另设一报，以谋抗我。惨刑讯于先，已属害民，又欲将民间所能直言之日报代以官之新报，是属侵民于后”^⑨，对《汇报》的官方背景语带讥讽，并直陈自己的民间立场。关于《申报》与杨乃武案联系之密切，《清稗类钞》有一段记载：

……乃武与毕均延颈待决矣。时上海已有《申报》，载之甚详，报端复缀一联云：“乃武归天，斯文扫地。”为其同年友所见，大愤……会春试，咸计偕入都，谒乡人刑部侍郎夏子松少寇同善，诉乃武冤……^⑩

由此，《申报》对两案客观积极的报道、对清司法制度的剖析指斥，客观上形成民间意见代言人的公众姿态，并逐渐使自己成为强大的舆论引导力量，使更多人关注两案甚至走向深度参与。两案由普通社会新闻成为社会焦点问题的过程，可以认为是《申报》与变动中的上海社会观念密切结合，并双向传播的过程。

其次，二杨案本身所具备的传奇和戏剧因素，使《申报》加速融入上海大众文化市场。江浙移民大量涌入上海，将嗜好小说演义和戏曲传奇^⑪的风气带入上海，且进一步强化。移民们被迫中断与原有宗族圈和伦理教化传统的联系，以商业等职业性的谋生手段为生活中心，除用戏剧和传奇故事填充精神空白外，渴望现实生活戏剧化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戏剧化的东西被人为地制造出来。倡优阶层在使生活娱乐化的同时，逐渐走入大众文化生活中，正暗合了这种社会性的心理期待^⑫。二杨案本身的符号象征性，使其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借助《申报》的传播功能，恰到好处地充当了使生活戏剧化的角色。杨月楼案历时一年多，枝节横生，因果曲折；杨乃武案历时三年多，经过县、府、省、钦差多级审理，一直上诉到两宫太后处，中间起伏跌宕，惊险迭出，两位主角由被判死罪而至雪冤生还，充满了戏剧性的悬念和意外。杨月楼作为红极一时

的京剧名生成为被诬害的对象，自然有双重的戏剧性因素；而杨乃武作为“有文名”而“性高亢，好持吏议短长”^⑬的名城名士，卷入人命案，亦极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两案起因都与情恋主题有关，杨月楼妻子韦氏以一良家出身的“痴情女”，矢志委身于“戏子”；杨乃武案中的葛毕氏，因貌美诱人而陷入复杂迷离的命案，这与传奇作品中涉及到两性关系的“才子佳人”、“万恶淫为首”等经典主题虽不完全对应，但掩藏在“刑讼”、“诱拐”、“奸夫淫妇”、“谋害”、“冤狱”等词语下的暗示性情节，却易于唤起读者丰富而暧昧的联想，其传奇性和隐喻性近似文艺作品，因其真实而更胜一筹。从大众心理来说，市民对两案报道有远超一般社会新闻的兴趣，除关注司法公正的因素外，更因它们可作为戏剧、评话、小说等大众娱乐的现实替代物^⑭。1873—1876年对两大案件近170篇富于传奇性的详细报道，凸显出《申报》近代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并使《申报》在更深层意义上融入上海社会生活。

五、结语

作为中国第一份商业性华文报，《申报》的市场基础和文化特点主要在初创五年中奠定。按保守记载，《申报》在这五年中日发行量共增加约4400份，年平均递增880份；而1877—1912年的35年中，共增加2000份，年平均递增不到60份。同时申报馆将白话报和画报作日报辅助，尝试拓展不同市场空间。到1877年初，《申报》已在“各省码头风行甚广”^⑮，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其内容如老报人张默的概括：“一为谕旨宫门抄等，以备官场之浏览；一为大小考试文章题目，以备学子之揣摩；一为诗词歌曲，以备名流文士之推敲，一为各地盗命火警及一切狐怪异闻，以备一般人茶余酒后之谈助。”^⑯形成覆盖官绅、士人（新旧文人及职员）、商、工、艺（含妓、优）诸阶层的稳定受众群，其格局在1905年大改版前无大变动。

旧式文人出身的《申报》主笔，得力于报主美查的商业化办报理念，采香港和上海旧有华文报之长，并把外文报作为国际信息源；同

时他们深谙江南文化传统和上海城市文化动态，在深厚的本土文化基础上将立足上海大众、面向华人社会、倡导社会进步作为经营定位。对华人权益的关注，尤其是对杨月楼和杨乃武案的报道参与，是《申报》较快融入社会生活的契机。初期《申报》市场的空间定位和社会敏感度，表现出商业报纸的良好文化包容性和适应能力。

《申报》创立时能依托于租界的治外法权背景，得以公开倡导新闻自由和社会公正，其经营稳定性也得以保障，从而把现代新闻理念引入上海社会。另一方面，上海城市化的“前工业化”特点决定《申报》市场由从事中外贸易人群起步，而办报的商业宗旨也始终明确。《申报》出于商业原则秉持舆论稳健主义，尽

力避免与官方正面冲突，这直接造成它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威信低谷，也使对《申报》的评价历来便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它的政治保守性与它总体的商业成功和信誉是相辅相成的，如徐忍寒所言：“此本报所以彻始彻终，抱稳健之主义，持镇静之态度，不激不随，无偏无颇。故中外人士咸有中国第一流报纸之目，岂一朝一夕所能幸致者。”^⑧从现代传媒产生一般规律看，《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形成途径是特殊个例，但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上海却有着普遍性。《申报》初创时在市场利益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微妙平衡，奠定了它在理论和民间经验中成为真正“大众”媒体的基础，从而使行世77年的《申报》比其他近代媒体有着更为突出的社会认识意义。

①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兄 Fredredruck Major）兄弟先在中国从事贸易和其他实业，70年代初经营不景气，开始寻找新的投资领域。

②缩写为《申报》。

③《本报作报本意》，1875年10月11日《申报》。

④《上海之报界》第15页，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聚珍仿宋版。

⑤⑧梁启超：《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见《清议报》（1901年）第100号刊。

⑥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见《报坛逸话》第66页，世界书局1940年版。

⑦此前买办陈莘庚看到中文《上海新报》“销路好”，“便劝美查办中文报纸”，见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第19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⑨〔美〕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第34页。他概括的七点是：第一，至少每周出版；第二，机器印刷；第三，各阶层都有能力购买；第四，刊登普遍感兴趣的而不是某类专门的消息；第五，能让普通文化水平的人读懂；第六，及时；第七，具有长期的稳定性。本书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⑩〔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第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⑪186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转引自马长林《人口迁移与近代上海都市化》，见《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第280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版。

⑫原文见乐正《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商强工弱的格局，使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不是由工业来推动，而是靠商业的力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后，主要不是被工业吸收，而是被第三产业部门所吸收。”见《天津社会科学》

1992年第2期。

⑬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第1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⑭容闳：《西学东渐记·经商之阅历》第40页，《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⑮王萃元：《星周纪事》，转引自叶孝慎《上海旧影·移民世界》第1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⑯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第105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⑰主要有1770年由申江书院改建的敬业书院，1865年建立的龙门书院，1828年建立的蕊珠书院，及1765年建立的嘉定当湖书院等。

⑱主要有1846年美国文惠廉设立的男塾，1847年美国基督教怀恩堂设立的怀恩中学，1849年耶稣会士设立的徐汇公学，1850年英国圣公会设立的英华学塾、美国圣公会格兰德设立的神文女塾，1851年法国拯亡会设立的启蒙学堂、美国圣公会设立的文纪女校（后来的圣马利亚女子中学），1853年法国天主堂设立的明德女校（后来的仿德女子中学），1855年法国天主教拯亡会设立的徐汇女子中学，1860年美国长老会范约翰设立的男塾，1861年范约翰妻设立的女塾（后来的清心书院），1855年法国天主堂设立的类思小学、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培雅学堂，1866年基督教设立的度恩学堂，1867年天主教设立的崇德女校等。

⑲王定九：《办报的门径》第2页，见王定九《上海门径》，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版。

⑳㉑见《上海会审公廨概述》，《东方杂志》第20卷20号第125、第129页。

㉒《申报》创刊时馆主的几位合伙人都是英籍，有伍

华特 (C. Woodward)、普来亚 (W. B. Pryce)、约翰·瓦基洛 (John Wachillop)。1888 年美查将《申报》馆与江苏药水厂、燧昌火柴厂、申昌书局共同组成“美查有限公司”，1889 年收回本利回国，公司由四位董事（三位外籍，一位华籍）主持，由履泰洋行经理埃皮诺脱 (E. O. Benthnot) 总负责，一直到 1910 年《申报》馆企业主权转让给华人席子佩。《申报》馆址中间曾两迁但都未出租界（山东路和汉口路）。

②⑥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第 3、第 2 页，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抽印本，上海通志馆 1935 年版，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72 页，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②⑤由主办《字林西报》的字林洋行主办，1861 年创。

②⑦⑧胡道静：《报坛逸话》第 10、第 13 页，世界书局 1940 年版。

②⑨《北华捷报》（《North - China Herald》）由英国侨商亨利·奚安门创立，后出日刊《航务商业日报》，1864 年 7 月另出《字林报》（即《字林西报》），《北华捷报》遂成为它的星期副刊。《上海通信》（《Shanghai News Letter》）是在沪美侨的第一份报纸，专载商船运输消息和美国人来华名单。

②⑩《本报作报本意》，1875 年 10 月 11 日《申报》。

②⑪杨瑾净：《外国侵略者办的〈上海新报〉与太平天国运动》，1962 年 6 月 16 日《文汇报》。

②⑫《申报》创刊时，美查聘浙江举人蒋芷湘为总主笔，聘同为浙人的秀才钱昕伯、何桂笙为主笔。

②⑬《何桂笙五十寿序》，1890 年《申报》，转自宋军《申报的兴衰》第 19 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6 年。

②⑭第一任主笔为伍德 (M. F. Wood)，第二任为傅兰雅 (John Fryer)，第三任为林乐知 (Young J. Allen)。

②⑮据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考证，在《上海新报》之前或同时，除《教会新闻》等上文提到的报刊外，较有影响的中文刊物还有马礼逊创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15-1821 年)、麦都斯编于巴达维亚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1826)、吉德编于马六甲的《天下新闻》(1828-1829)、郭希猎等编发行于广州和新加坡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1838)、麦都斯等编于广州的《各国消息》(1838)、麦都斯创于香港的《遐迩贯珍》(中英文对照，1853-1856)、伟烈亚力编于上海的《六合丛谈》(1857-1858)、陈葛廷编于香港的《中外新闻七日报》(1871 年创)、黄胜编于香港的《香港船头货价纸》(1857 年创) 等。

②⑯以上外文报的原文名称分别为《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North Daily News》、《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The Shanghai Bud-

get and Weekly Courier》、《Shanghai News Letter for California and the Atlantic States》、《Le Nouvelliste De Shanghai》、《Der Ostasiatische Lloyd》。

②⑰姚公鹤：《上海闲话》第 13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⑱⑲《论各国新报之设》，1873 年 8 月 17 日《申报》。

②⑳这个阶层相当于科恩所称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可参考叶晓青《19 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平民文化》中的有关论述，《上海研究论丛》第 9 辑第 190 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㉑分别见于 1872 年 6 月 8 日、1873 年 7 月 18 日、1874 年 11 月 7 日、1874 年 11 月 14 日、1875 年 3 月 11 日《申报》。

㉒《申报总录后》，1875 年 7 月 10 日《申报》。

㉓《本馆自叙》，1872 年 9 月 9 日《申报》。

㉔珠街雅卿甫胡熙：《日报文仿制仪礼》，1875 年 3 月 17 日《申报》。

㉕⑳《创刊告白》，1872 年 4 月 30 日《申报》。

㉖⑳《申江新报缘起》，1872 年 5 月 4 日《申报》。

㉗见《申报》创刊号。

㉘《本馆作报本意》，1875 年 10 月 11 日《申报》。

㉙关于《申报》的性质，韦少波曾在 1985 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 4 期的《辛亥革命前上海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一文中认为《申报》与《字林西报》和《德文新报》一样是“为殖民主义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舆论工具”，笔者不敢苟同；宋军认为《申报》馆主美查“主持社会公道，注意维护华人的利益，也许这就是他自己在‘告白’中申言的‘不能利而忘义’”的观点较为公允，文见宋军《申报的兴衰》第 12 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6 年版。

㉚“江南区域空间”提法参见《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第 175 页，原文为：“美国著名城市史家施坚雅曾指出：‘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时，一个比较适当的研究单元……是一些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区所合成的经济区域’。如果我们从江南区域空间来审视苏、杭城市，就会对其城市功能的近代化萌芽有更全面的认识。”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江南”包含地理、文化、经济内容，以明清两朝约定俗成的概念为准，参见苏州大学徐茂明教授在《史林》2002 年第 3 期的《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一文，徐认为明清“江南”这一名称的地域范围实指“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此区特征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

㉛朱维铮在《晚清上海文化：一组短论》说“晚清上海的都市文化，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已趋于定型”。见《上海研究论丛》第 9 辑第 174 页，上海社

科院出版社 1993 年版。上海城市文化的成熟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⑤④《申报馆条例》，见《申报》创刊号。

⑤⑤早期报馆来稿刊登要收费，《申报》不收费是一种进步，从 1884 年《点石斋画报》创刊后开始付稿费。

⑤⑥顾应祥语，转引自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 97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⑦王韬：《瀛壖杂志》第 7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晚清书画家杨逸在《海上墨林》列出 741 名历代上海书画界活跃人物，其中晚清时期最多。从杨逸的记载看，咸同之际的居沪书画家属本地籍的不到 100 人，侨居的“寓贤”（清代 305 人）则有 200 多人，超过书中所收 312 名上海历代“寓贤”的 2/3。

⑤⑧⑨姚公鹤：《上海闲话》第 128 页、第 127 页、第 127—12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⑤⑩胡祥翰：《上海小志》卷四第 1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⑤⑪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第 2 页，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抽印本，上海通志馆 1935 年版，上海档案馆藏。

⑤⑫据《1865 年工部局年报》统计，上海租界 6580 个有职业的华人中，人数居前 20 位的职业有洋行雇员（第五位）、船商丝商及棉商（第九位）、钱庄主和助理（第十位），人数共有 752 人，约占总数的 10%，如考虑无业和非租界居住华人等情况，这个比例要更小。

⑤⑬《本报作报本意》，1875 年 10 月 11 日《申报》。

⑤⑭因过桥再无须交费，“外摆渡桥”被上海华人称为“外白渡桥”，此名沿用至今。

⑤⑮在《论英华会审事》一文中，《申报》完全站在华人立场评说租界会审中的不公平。

⑤⑯初期《申报》除关注租界华人外，亦关注海外华人权益，对当时贩卖华工、华工在海外受辱的情况多有谴责报道，并分析成因和提出对策。

⑤⑰《汇报》（1874 年 6 月—1875 年底）为容闳参官股创。英人葛理主笔，后为法人。

⑤⑱杨月楼案：杨原为显宦家伶，文武行兼擅，时为沪京剧名优，与商人女韦阿宝定情，但遭韦氏族人反对，不得以采取“劫婚”办法，后被上海县拿获，以诱拐治罪。案情几起几落，最终杨被逐出上海。杨乃武案：余杭人杨乃武被诬与葛毕氏通奸并害死其夫葛

品莲，此案经重重曲折，终经刑部复审而获昭雪，自封疆大吏以下数十名官吏受到处分，其中《申报》的舆论参与功不可没。

⑤⑲⑲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第 24 页、第 110 页，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⑳袁翔甫：《续沪上竹枝词》，见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二）第 800 页、第 801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㉑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二第 2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㉒叶晓青：《19 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平民文化》，《上海研究论丛》第 9 辑第 202 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㉓⑳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三第 53—54 页、第 2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㉔《论中西礼刑不同》，1875 年 8 月 25 日《申报》。

㉕《书墨痴生来信后》，1874 年 11 月 21 日《申报》。

㉖徐珂：《杨乃武被诬杀人案》，见朱寿朋《杨乃武冤狱》第 40 页，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㉗广义的“传奇”是戏曲的通称；但明清以来，“传奇”专指一种特殊的戏曲体裁。详见郭英德《明清传奇史》第 8—10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㉘参见许敏《士·娼·优——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一瞥》谈晚清上海艺人：“他们享有犯忌、僭越的特权。市民们所渴望的戏剧性生活，便由他们充当代表、充当演员在社会上展示。而一般市民则通过观赏、评论的方式来参与……”见《史林》1992 年第 2 期第 60 页。

㉙祝善诒：《余杭大狱记》，见朱寿朋等《杨乃武冤狱》第 35 页，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㉚“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案昭雪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剧编成，先在上海而后在南北各地被各类剧种和艺术形式搬演，作为名剧从清末演到民国，由此可见此案情节与戏剧因素的天然相通。

㉛葛元煦：《申报馆》，见其书《沪游杂记》第 1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㉜张默：《六十年来之申报》，见申报馆《申报概况》，申报馆 1935 年版。

㉝徐忍寒：《予对于本报已往之观察及将来之希望》，见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季》（1872—1922），申报馆 1923 年版，国家图书馆藏。